

昆曲

的传播流布

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
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 宋波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昆曲

的传播流布



昆曲

的传播流布

昆曲

的传播流布

昆曲

昆曲 的传播流布

宋波 著

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

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宋 波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曲的传播流布 / 宋波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2

(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5313-2769-4

I. 昆… II. 宋… III. 昆曲 — 戏剧史 — 研究
IV. J 8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998 号

昆曲的传播流布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 平 唐惠凡 白 光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印刷总监 张 斌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50mm×230mm

字数 233 千字

印张 17 插页 2

印数 1—2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4.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总 序

孙家正

昆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经过历代剧作家、演剧家的创造和积累，昆曲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昆曲剧作继承了中国悠久的诗歌和文学传统，文辞优美而又丰富多彩；音乐委婉清丽，能够表现深刻细腻的感情；行当分工精细，表演规范而细致入微。数百年来，昆曲舞台上塑造出了不胜枚举的艺术形象，培育出众多彪炳文坛的剧作家、音乐家和表演艺术家，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作为成熟较早的古老剧种，昆曲也给后起的众多地方剧种以丰富的滋养。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将昆曲艺术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对于昆曲来说，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件好事，但它反映的状况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昆曲艺术越来越被世界所瞩目，忧的是凡被列入遗产代表作的艺术，大抵是现状不容乐观，面临困境，有的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昆曲艺术的保护和振兴不能急功近利，要立足长远，要做长期艰苦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昆曲便给予了积极扶植，组建了昆剧院团，积极倡导传统剧目的整理和新编剧目的演出，重视培养新的昆曲人才，昆曲艺术得到新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了迅速发展，但一些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形势面前却步履蹒跚。为适应新的形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家文化部于1986年成立了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举办培训班和昆曲剧目汇演等艺术活动，

保护和振兴昆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文化部根据原有的对昆曲的保护政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保护、继承、革新、发展”的昆曲工作“八字方针”，加大了经费投入力度，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落实“八字方针”的具体措施。作为落实“八字方针”的重要举措之一，文化部于2002年10月在江苏苏州和昆山举行了全国昆曲优秀中青年演员评比展演，二十一位中青年演员被授予“促进昆曲艺术奖”；同时，还奖励表彰了三十二位长期潜心于昆曲艺术事业的艺术家和学者。

为了全面贯彻“保护、继承、革新、发展”的昆曲工作“八字方针”，正确解决保护、继承和革新、发展的辩证关系，我们必须加强对昆曲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昆曲积淀了悠久的古代戏曲文化，又滋养了众多现代戏曲文化，对昆曲艺术的理论研究在戏曲理论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我国古典戏曲理论有丰富的遗产，在昆曲繁荣兴盛的明清两代，古典戏曲理论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关于昆曲的剧本、音乐和表演的研究、评论，是我国古典戏曲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新文化，对于这些理论遗产需要加以系统整理并进行现代阐释。昆曲艺术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要求，难于掌握，必须深刻理解它的艺术特点、创作规律和美学意蕴，才能在舞台上把它传承下来。因此，加强昆曲艺术理论研究十分必要。

昆曲文辞典雅，唱腔格律谨严，一般观众不易听懂，这也正是昆曲存在消亡危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在普及宣传上花费更多的工夫。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后，有更多的人希望了解昆曲，希望读到有关昆曲的书籍。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其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在昆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图片和音像资料。为昆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承担的。成功申报使世界认识到中国昆曲的价值。为此，文化部特别表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之后他们又积极承担了文化部这一昆曲艺术研究项目。这套

丛书就是有关部门委托他们组织全国一批老中青专家共同撰写的。

“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昆曲著作。“丛书”以昆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为切入点，多角度、多方位加以论述，选题不仅新颖而且具有较高价值，如“昆曲与文人文化”“昆曲与明清社会”“昆曲与明清乐伎”“昆曲与人文苏州”等。选题有的立足昆曲本体，如“昆曲的创作理论”“昆曲表演艺术论”“昆曲的传播流布”；有的侧重昆曲的学术研究，如“20世纪前期昆曲研究”等，对昆曲进行理论与文化多角度的深入探讨，这在戏曲研究史上是颇具开创性的。这些选题一方面提升了昆曲研究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昆曲艺术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昆曲作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保护、继承，或作为历史文化的认知，或作为当代艺术的现实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拓展了戏曲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研究与普及的结合，其中“中国的昆曲艺术”就是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集体撰写的一部普及性、知识性、通俗性的昆曲读本，从而使该“丛书”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编辑出版这样一套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有创新、有深度、有理论、有资料的昆曲艺术研究“丛书”是一项大工程，是昆曲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透过它，可以使广大读者对昆曲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及其发展有更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

目 录

总 序	1
绪 语	1
第一章 概述	8
第一节 昆曲的传播	9
第二节 昆曲的流布	19
第三节 传播和流布的互动	25
第二章 昆曲在明代	35
第一节 从“清唱”到“官腔”	35
第二节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44
第三节 乐府争传绝妙词	54
第四节 杏梁余韵转雍容	96
第三章 昆曲在清代	152
第一节 未成曲调先有情	153
第二节 泉下故人呼欲出	169
第三节 古调虽自爱，令人不多弹	184
第四节 烂熟传奇人未解	195
第四章 昆曲的流布	215
第一节 何曾听罢不言君	215
第二节 浙昆、徽昆、湘昆、北昆	218

第五章 昆曲在近现代	228
第一节 红牙一任敲残月	228
第二节 幽径无人独自芳	234
第三节 香在无心处	237
结 语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57

绪 语

公元1368年，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最终在逐鹿中原的惨烈争斗中脱颖而出，高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①旗号的朱明王朝定鼎南京。被严厉指斥为“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②的元蒙王朝，在统治华夏大地九十余年后被迫退归大漠，中断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汉统恢复了。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昆曲的传播和流布，因此，并无意对明代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作更多议论，不过由于昆曲的文学剧本基本上是知识精英的艺术创造，绵延数百年的古典戏曲理论研究大致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而在宫廷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对立中，精英文化对昆曲的作用又尤为突出，所以需要讨论文化传播及流布方面的一些问题时，不得不在行文中对明代的社会政治、特别是文化创造和知识分子的心态作一个极其简单的评述。

毫无疑问，长时间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大众，一般地只能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建立在一个虚幻的君主制度基础之上，大家所祈求的也只能是出现一个高高在上的圣明君主以及围绕在他身旁的贤德官僚的贤明统治。这是一个美梦，是一个代代流传令小民们不愿惊醒的美梦。由于儒家文化广泛而深远的传播，许许多多经过加工粉饰的样板，其充满诱惑的色彩却令人沉溺其中不愿自拔。且不说遥远的尧、舜、禹、汤时代，也不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美丽场景，就是“文景之

注①② 宋濂《谕中原檄》，《中华通鉴（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治”“开元盛世”，也足以叫苛政之下、乱世之中的百姓热烈企盼了。或者说，因为乱世绵延不绝，暴君屡见不鲜，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致使贤德统治已经衍为百姓精神生活中的必需。可是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必需呢？至圣先师孔夫子在《论语》中就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过基本的论述；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发挥为“王道之三纲”，即“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到了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家班固时，“三纲六纪”已经固化为不可动摇的精神山岳。在《白虎通义》中对一系列政治哲学、伦理观念、道德思想的讨论，最终以教条的形式凝固不变。垂两千年间，它变成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循的思想指导，维系道德秩序的支柱，无孔不入的精神网罗。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纲纪而万目张也。^①

至此，三纲、五常、六纪成为了古代中国社会道德规范的准则，伦理关系的精神“宪法”。虽然在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不乏鸿儒硕学对它阐发润饰，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却始终不曾动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纲纪观念的出现，对于维护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稳定，约束群体行为，调节人际关系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僵化的伦常纲纪教条，也无情地扼杀着人的个性发展，束缚着思想解放，甚至相当程度上阻碍着历史的前进。不幸的是，明王朝的建立，在伦常纲纪的推行和宣扬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较之前朝各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纲常观念在明代彻底变成了僵死的思想桎梏。

无论明王朝以后的发展如何地令人恐惧、沮丧，甚至绝望，但是，和把人分为四等的元朝比较，当时它的建立是受到了民众热烈欢迎的，尤其是元朝统治下政

注 ① 宋濂《喻中原檄》，《中华通鉴（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治、社会地位低下的北人、南人开始从残酷的民族压迫重负下解脱出来，其欢欣鼓舞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和一般普通大众渴望安定平静生活的渺小愿望相比，明代的知识分子们由于科举进仕的宏大抱负终于有机会实现，三纲五常的社会道德秩序可能得以重新架构，欣喜若狂的心态更是溢于言表。

朱元璋并没有让心急如焚的知识分子等待太久，1370年他就颁布了《开科举诏》：“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于是，一切问题似乎都解决了，起码从流传下来的文字看，从代表了大明王朝推戴的正统文化的继承者——鸿儒硕学的言行看，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后世对朱明王朝的评价一向不高，因为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政治极权、文化专制、特务统治、君王暗昧、后妃弄权、重臣误国、朋党专断、阉竖专宠、卖官鬻爵、八股盛行等等政治、社会弊端，好像都在明朝发挥到了巅峰极致，特别是科举中直通仕途的八股文考试形式，由于其诱惑力的巨大与现实，使绝大多数的读书人趋之若鹜，沉溺于现成的八股文刻本之中难以自拔，古圣今贤所著明经正史反倒无人问津。有明一代宰辅十分之九是进士出身，更为渴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读书人树立了直观形象的科举——读书——做官的楷模，也把科举取士制度推向高峰。明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考试命题的范围，又以宋代大儒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更有规定的试卷格式，自朱棣起，还把考试的体裁确定为“八股文”。于是乎凡是有志竞奔于仕宦之途的知识分子们所能够进行的工作，就是抱着各式各样的坊间刻本死记硬背，以至“四书”“五经”的通读、翻阅的基本要求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十八房（按：明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试卷，谓之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至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

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概不观。”^①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风气被败坏、道德被腐蚀，于是顾炎武讥讽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偈矩矣乎？……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②

所谓“时文”就是明代读书人进行科举考试所必须熟练掌握的八股文，目睹了明末知识分子不争气的表现和无所事事的行为后，也难怪身为大学者的顾炎武会对八股文如此深恶痛绝。

出身微贱，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后，一方面急于通过科举招揽治理国家的人才，另一方面，却是迫不及待地铲除可能的政治隐患。连续不断的血腥“诏狱”，令所有为官从政的臣属们陷入了无限的恐慌和惊惧中。从洪武十三年（1380）开始的“胡惟庸案”起，恐怖就伴随着朝中的文武百官，因为一旦龙颜大怒，获罪掉脑袋的将不是被怪罪某一个人，而可能是他的全家，甚至“三族”乃至“九族”。胡惟庸以后，著名的大案还有洪武二十三年的李善长案、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遭到株连的无辜受害者都超过万人以上，就连《明史》中也用上了“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这样不疼不痒的字眼。而洪武、永乐两代之后，明王朝的政治统治急速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各种政治势力轮番把持朝政，在思想、文化方面能够振振有词的知识阶层虽然充斥于各级行政机构中，在国家管理的问题上，却只能无所事事地听凭势力集团的摆布。由于明代选拔国家治理人才的最主要渠道就是开科取士，渐至知识分子成为官场中的主要成员，但是，“文字狱”的大兴，“诏狱”“廷杖”的无情，无孔不入的特务制度，宦官时代的降临，却让这些走进官场的老臣新贵们不得不噤若寒蝉。一如朱元璋所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囊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过。”由此，明代衍生出一种

注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危林·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7～858页。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危林·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3～858页。

奇怪的现象，明知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的知识分子，为了不负“十年寒窗苦”，不顾一切地要冲过科举的门槛，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疯狂地扑向平地青云的科举钓钩。可是一旦置身官场，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在平安，冲出“文字狱”的围墙，告老还乡，回归林下，既可以安全地享受官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生涯带来的无尽财富和荣耀，也能够潜心于文章著述之中，别辟蹊径去彰显声名而不必受案牍之累。他们及其亲属，与当地跳过了“八股”龙门的秀才、举人、进士，向来根基深厚的地主豪强，在各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个中央政府难以撼动的地方利益集团——缙绅阶层。富庶的江南地区，由于文化传统的深厚，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理解得透彻，自然涌现出大批跳过“八股”龙门的儒生文士，其缙绅阶层的势力也更加强大。

昆曲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明代有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和广泛的文化产物——长篇小说和传奇创作，这两种东西我们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当时文人的创造物，但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它们所走的绝不是同样的道路。不管我们对明代的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目的做出怎样的评价，可是当知道了明代经厂本、藩刻本、监刻本、坊刻本、私刻本蔚然成风，福建、江浙、四川、苏州、徽州、南京、北京都先后成为书坊重心，而存世的明代私刻本数量之丰、质量之优，尤其为人称道的时候，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当时社会对阅读书籍的要求是普遍而广泛的。在袁恬《书隐丛说》中描述的“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氛围中，竟形成了“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士仪并充馈品”的官场风气。李诩曾谈道：“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①顺理成章的就是明代小说和传奇创作得以借助印刷业的蓬勃发展而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广为流传。沈德符曾说：“涵虚子所记杂剧名家凡五百余本，通行人间者，不及百种。然更不止此。今教坊杂剧约有千本，然率多俚浅，其可阅

注 ①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时艺坊刻》，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

者十之三耳。”^①

虽然从艺术创造角度看,明代长篇小说和传奇都称得上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代表,但是,它们的艺术价值取向和文化传播的对象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差异极大。明代传奇创作自始至终是以文脉正宗自矜、时代宠儿自居的。沈宠绥信心十足地说:“粤徵往代,各有专至之事以传世,文章矜秦汉,诗词美宋唐,曲剧侈胡元。至我明则八股文字姑无置喙,而名公所制南曲传奇,方今无虑充栋,将来未可穷量,是真雄绝一代,堪传不朽者也。”^②王骥德更是洋洋恣肆:“曲,乐之支也……入宋而词始振。署曰‘诗余’,于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然单词只韵,歌止一阕,又不尽其变。而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如世所传董解元《西厢记》者,其声犹未纯也。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栴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其声近嚙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人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③他们说的就是昆曲,他们的观点具有相当代表性,那就是传奇由诗词歌曲发展而来,其创作从文脉上继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正统地位,是艺术史中傲视百代的高峰之一。昆曲是以传奇为文学载体的戏曲样式,因此,它和明代传奇创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它又是活跃于舞台上的声腔剧种,自身具有独特的艺术要求,并非是纯粹的文字创作,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昆曲,应该明确两点:一个是传奇形式是当时很多声腔剧种的文学载体,不能以传奇作为昆曲文学剧本的代称;一个是在以传奇为文学载体的声腔剧种中,昆曲的影响和成就最引人注目,以至它几乎成为了南曲的代称,很多讨论传奇的著作中,都是以昆曲为对象的。大量知识分子对文学创作的参加和介入,对艺术形式上的加工和雕琢,奠定了昆曲典雅含蓄的风格,毫不夸张地说,

注 ① 沈德符《顾曲杂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14页。

② 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97页。

③ 王骥德《曲律·论曲源》,《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

如果传奇当时就被视为艺苑王冠的话，昆曲就是王冠上璀璨的明珠。

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虽然也兴盛于明代，而且同样是由知识分子进行整理、编创的文学作品，也同样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但是在明代，它似乎从来没有取得过和传奇平起平坐的地位。“今世传街谈巷议，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之下。”^①长篇小说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面向民间读者的，或者说，是书坊出于商业流行目的而有意推波助澜的。因此，它的艺术价值取向和传播对象都有所区别。就艺术价值取向而言，长篇小说首先是通俗的、大众化的，因为只要它需要进入书坊流通领域，它必然受到市场无形的操纵，即使作者无心于此，可是书坊不得不被商业利润所左右，从大量的编纂、删改、修订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在沈德符《顾曲杂言》中有过关于《金瓶梅》出版的记载：“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摧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箠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从传播对象看，长篇小说创作由于其篇幅、规模的限制，很难闭门造车，势必大量吸收已有的文学素材，借鉴传统说话的创作经验，关心读者的兴趣。换言之，明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对象不仅仅是一般有阅读能力的读者，也包括可以并且乐于接受小说内容的百姓。或者，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点，昆曲从最初就为自己埋下了衰落的种子；也或者正是由于昆曲文学创作最初就不肯俯就芸芸众生的审美趣味和认知取向，才铸就了它独特的美学品格和价值体系。

注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1页。

第一章 概 述

昆曲的兴盛,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至少已有四百年之久;昆曲的出现,从现有的文字记载,可以直接追溯到元末明初,即距今约七百年左右。而寻根溯源,我们有理由相信,昆曲是继承了宋元时期南戏体制,由昆山地区的民间曲调和宋元南曲演唱艺术相结合,从地方声腔发展而来的戏曲剧种。昆曲的许多别名,如“昆山腔”“昆调”“吴歙”“南音”“昆腔”“昆剧”“雅部”等,无不见证着它古老的历史。戏曲是我国特有的戏剧形式,它集唱、念、做、打等表演手段于一身,熔诗、歌、舞、乐等艺术要素于一炉,化词、赋、曲、画于一体,具有完备而规整的表演体系。在由不同的民间、民族声腔剧种组成的戏曲家族中,若论及历史的久远,影响的广泛,昆曲是首屈一指的。讲到特色的突出,艺术的精妙,昆曲同样令人瞩目。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今天戏曲的表演体系,就是在昆曲表演体系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昆曲是当之无愧的“百戏之祖”。

据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就知道昆曲,他曾经召见昆山耆老周寿谊,并颇有兴致地发问:“闻昆山腔甚佳,尔亦能讴否?”尽管我们无法准确推定昆曲产生的时间,不过周寿谊以长寿缘故(生于宋代,而明初尚在)在明人笔记中曾被屡屡提及。大约洪武六年(1373)他被“召至阙廷,赐以酒饌”的记载是可信的,因此也有理由相信,昆曲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朱元璋提到“昆山腔”以前。那么,朱元璋所说的“昆山腔”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从洪武年间就上达天听的昆曲又为什么直到嘉靖年间才渐入佳境呢,应该怎样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审视昆曲呢,昆曲是以怎样的形式流布四方的呢?……